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6.11.11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从『哪有什么侠』到『侠之大者』

——《镖人:风起大漠》的武侠类型重构与中国电影学派实践

■文/侯光明

2026年春节档,《镖人:风起大漠》以超过14亿元的票房登顶中国影史武侠片票房榜,并获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7项提名。在武侠片被普遍视为式微的背景下,这一成绩别具意义。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一种本土类型如何在承续传统的同时,与当代观众重新建立对话。《镖人》在叙事伦理、动作美学与生产机制三个层面的探索,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类型实践提供了一个分析样本。

► 类型困局:“武”的膨胀与“侠”的失语

中国武侠电影是少数真正从本土文化土壤中生长、又为世界所熟知的电影类型。从1928年《火烧红莲寺》掀起第一次武侠电影热潮,到胡金铨的写意江湖与张彻的阳刚美学;从《少林寺》引发的武术热,到徐克开启的新武侠浪潮,再到《卧虎藏龙》以东方意境获得国际认可,武侠片始终是中国电影文化自觉的重要载体。即便在2010年代前中期,《一代宗师》《绣春刀》《刺客聂隐娘》等作品仍以各自的方式拓展着类型表达的边界。

然而,201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型陷入持续困局。数字特效迅速普及,飞天遁地的视觉奇观逐渐取代演员身体的真实表演。动作人才断代,制作端高投入与高风险并存,视觉奇观又同质化堆砌,不断消耗着观众的审美耐心。2025年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虽以6.89亿元创下当时内地武侠片票房新高,口碑却未达预期。此外,一些武侠漫改作品也遭遇了类似困境。

究其根本,问题在于“武”的形式膨胀遮蔽了“侠”的精神内核。武侠之所以为武侠,在于“侠”字承载着中国人对道义、承诺与生命尊严的理解。一旦失去与当代人精神世界对话的能力,再炫目的奇观也终难支撑类型的长远发展。这既说明武侠片亟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电影学派必须要回应的重要命题。

► 凡人成侠:侠义伦理的当代重述

《镖人》最具理论价值的探索,在于它改写了“侠”的生成方式。在传统武侠叙事中,侠往往被预设为一种先验身份。从黄飞鸿到李慕白,主人公甫一登场便已是侠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其与生俱来的担当,叙事所要做的只是将这份担当逐步展开。《镖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不预设一位现成的大侠,而是让一个身怀绝技却心存私念的普通人,一步步走向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主人公刀马的口头禅“哪有什么侠,我只是个镖人”,既是一句推辞,也是全片的叙事起点。他武艺高强,曾是隋朝左骁骑卫“十三死士”之一,如今却是身负“天字二号通缉犯”之名,流落大漠的镖客。出刀明码标价,走镖只为挣钱,心中唯一的牵挂是把妹妹留下的孩子小七抚养成人。武艺上他是高手,心性上他是凡人。当阿育娅向往长安的繁华时,刀马踢开树下的石头,指着底下的蝼蚁反问:胡杨林壮丽,又与沙土下的蝼蚁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凡人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也是他成长的起点。

影片为刀马设置了一条清晰的伦理进阶。第一重是契约。老莫托他护送朝廷“天字第一号逃犯”、以“花满天下”为理想的大儒知世郎前往长安,一纸镖单把一个只想过好自己日子的人卷入了天下格局。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称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镖人“收钱办事、言出必行”的行规,正是这种古老信义伦理在民间职业中的延续。第二重是遗托。莫家集覆灭之际,老莫提前遣散族人,自己独自留守,最终为保护知世郎而死。这趟镖由此从一桩买卖转化为逝者的遗愿。前人倒下,后人接续,是中国英雄叙事中最具感染力的结构之一。第三重是担当。刀马守护的对象,从身边的小七,到莫家集的族人,再到这趟镖所牵连的天下格局,完成了由小我向大我的跨越。与之并行的,是阿育娅从被庇护的部族少女到复仇者,再到留守大漠的守护者的蜕变,一条女性成长的叙事线索也由此成立。这一结构并非孤例。近年来,从《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到《长津湖》中的伍万里,“凡人英雄”已成为新主流电影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叙事路径。主人公带着私心与弱点,被时势一步步推至道德抉择的临界点,最终承担起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我不是药神”与“哪有什么侠”,都是英雄出场时的一句推辞。但两者的指向略有不同:程勇的推辞关乎道德资格,刀马的推辞则是对“侠”这一崇高叙事位置本身的拒绝。

《镖人》的意义在于它把这一当代叙事范式引入古装武侠,使“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再是英雄与生俱来的天命,而成为一个凡人逐步走向的方向。传统侠义中的“天下”情怀与当代凡人英雄的利他精神,由此找到了一个可辨识的接口。家国情怀没有被解构,而是被重新赋予了来路。这可以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类型创作中的一次具体实践。

► 身体归来:动作美学的去奇观化

如果说“凡人成侠”回应的是“侠”的问题,那么《镖人》在动作美学上的选择,回应的便是“武”的问题。在新世纪以来的武侠影像谱系中,《卧虎藏龙》将武打推向文人意境与哲学思辨,《英雄》以大写意、大色块的造型美学将武侠拍成视觉诗篇。《镖人》则回到地面,回到身体,回到实实在在的搏斗。导演袁和平曾为《卧虎藏龙》《黑客帝国》《一代宗师》担任动作指导,他强调动作“好看”的根基在于“贴合”,即要贴合人物性格,贴合剧情发展,贴合环境特质。这一原则使影片的多数打斗不再是孤立的技艺展演,而成为人物性格与处境的外化。开篇李连杰、吴京、张晋同场的对决,李连杰以一对二,短兵相接,凌厉狠辣,以真实的力度与痛感替代了飘逸的写意。沙暴中刀马与谛听的对决,迎风则举步维艰,顺风则借势发力,自然环境直接参与了动作的塑造。结尾的城墙决战,脚下城池燃烧,远方大漠苍茫,人物的腾挪空间却被狭窄的城墙牢牢限制,空间的逼仄恰与两人多年纠缠的恩怨形成同构。刀马的刀袋中装着环首大刀、双锤、斧头等不同兵器,随情境切换,看似随性却藏着重情重义的底色。阿育娅的弓箭则对应着她果敢凌厉的性格。兵器与人物性格彼此呼应,进一步强化了身体与技艺合一的动作美学。在数字奇观日益泛滥的语境下,这种对身体的回归尤显珍贵。

中国武侠电影的类型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武术“形神兼备”的身体文化:武打既是技艺的展示,也是心性的外化。特效可以制造奇观,却无法替代身体所承载的意志与温度。离开了真实的身体,武侠便失去了区别于一般奇幻片的类型根基。

► 协同生产:类型IP的工业化路径

《镖人》的另一重意义,在于证明了中国原创IP有能力支撑头部商业大片。影片改编自许先哲的同名漫画,原作以《隋书》《资治通鉴》等典籍为参照,在服饰、兵器等方面多有考据。十余年间,它完成了从漫画到动画、再到真人电影的跨媒介转化。在国产漫改真人电影屡遭挫折的背景下,影片在保留漫画气质与追求影像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将原著庞杂的人物关系浓缩进一段公路式的护镖旅程。

支撑这次转化的,是一支跨越代际的创作团队。从袁和平、李连杰,到吴京、谢霆锋、张晋,再到于适、陈丽君等新生代,四代武侠电影人同台。拍摄开场那场对决时,吴京曾感叹“三个人加起来160岁,然后瘸着腿,还在打”,道出了“真打”背后的代价。越剧演员陈丽君则将戏曲的身段与腰腿功夫化入骑射动作,使戏曲程式在银幕上转化为人物的身体表达。片尾,导演袁和平、《少林寺》导演张鑫炎与武术名家吴彬以三位老者的形象出镜。张鑫炎以《少林寺》将李连杰推上银幕,吴彬则是李连杰与吴京共同的武术恩师,这一安排以近乎仪式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

更深层的支撑来自生产机制。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各级电影主管部门、电影企业与电影从业者同向发力。《镖人》由福建重点扶持、立项出品,地方从立项阶段即深度参与,企业负责工业化的生产组织,主创团队负责艺术上的精益求精。电影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在此具体化为地方为原创类型大片承担风险的决心、成熟工业流程对硬核动作片的托举以及一支能打、能演、能传承的人才队伍。金鸡奖落户厦门以来,福建始终在为中国电影搭建平台。《镖人》的出现标志着福建正从电影节的东道主,向头部作品的出品地延伸。可传承的类型IP、可接续的人才梯队、可协同的生产机制,正是中国电影学派得以立足的产业基础。

► 未竟之路:从“被看见”到“被读懂”

肯定《镖人》的开拓意义,并不意味着回避其不足。其一,“武”与“侠”尚未达成充分平衡。影片兑现了“从头打到尾”的承诺,但高密度的动作展演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叙事空间,“侠”的深度被“武”的浓烈所冲淡。袁和平所强调的“贴合”原则,同样应当成为衡量整部影片的标准:每一场打斗,都应让观众对人物多一分理解。其二,凡人成侠的方向已经指明,却尚未走完。刀马从“哪有什么侠”到守护天下苍生,转折来得过快,几乎仅凭老莫的嘱托便生发出崇高的使命感,内心的挣扎与觉醒缺乏足够铺垫。问题在于知世郎这一人物。凡人英雄的成长往往需要一位引路人,让主人公看到比私利更高的价值。知世郎本应承担这一功能,“若一个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花满天下”一语,本可成为刀马成长的精神坐标,但影片对这一人物作了较多娱乐化处理。这位乱世大儒更多以戏谑面目出现,承担插科打诨与交代信息的功能。编剧俞白眉对此的解释是,漫画中知世郎“贯通古今”的超凡设定与真人电影追求的真实感相违和,因而更多着墨于其平凡普通的一面。这一取舍自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祛魅”之后,影片并未以足够的精神重量完成“复魅”。引路人的分量一旦被消解,主人公的成长便只能停留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层面,难以真正抵达“为国为民”。其三,走向世界仍是更长的课题。影片以约2.16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打破《卧虎藏龙》保持26年的纪录,登顶全球武侠电影票房冠军,表明东方武侠依然具有跨文化的吸引力。但被看见只是第一步,被读懂才是更长的路。功夫与奇观,世界早已熟悉,而“侠”背后中国人对道义、承诺与天下的理解,才是中国电影真正需要讲给世界的故事。

值得期待的是,以“玉面鬼”竖为主角的衍生电影《镖人:战起江都》已经立项,原著漫画的“长安篇”也已在创作之中,“镖人”的故事仍有广阔的展开空间。期待主线故事的后续作品把刀马的凡人成侠之路走完,让知世郎的理想真正照亮这段江湖,也期待“镖人”成长为一个可以长久传承的中国类型品牌。学派不只写在论文里,更要立在银幕上。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守正创新,中国武侠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方能在世界银幕上卷起属于东方的风沙。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

在回归与复兴之间

——《镖人:风起大漠》的类型重塑与时代命题

■文/饶曙光 茹纪晓

武侠电影承载着中国观众熟悉的江湖想象。刀剑交错之间,既有身体技艺的较量,也有信义、情感与人生选择的碰撞。然而,观众的观看习惯不断变化,电影的表现手段日益丰富,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武侠故事,今天还能如何打动人心?袁和平执导的《镖人:风起大漠》给出了回应。影片改编自许先哲的同名漫画,将苍凉大漠、江湖群像与酣畅的动作场面汇聚于银幕,在延续经典风骨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当代气息。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扎实的电影创作重现久违的武侠气象,并通过对经典美学的当代重塑,彰显出这一类型持续创新的艺术生命力与复兴潜能。

► 传统回响:武侠类型的美学根基与艺术承续

武侠电影为中国银幕留下了独特的江湖想象,刀剑相逢、快马驰骋牵动着乱世中的命运与抉择。影片将故事置于隋末西域,朝廷、豪强、镖客与流亡者交错,各自的生存诉求构成纷繁的江湖图景。刀马行走于权力秩序之外,因护镖卷入纷争,在险境中辨明信义与担当。由乱世而生的冲突、以行动展开的叙事,以及人物对道义的坚守,延续了中国武侠电影鲜明的类型气质。

回望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龙门客栈》以江湖险境中的侠义叙事留下经典印记,《双旗镇刀客》则以苍凉的西部景观与鲜明的刀客形象,拓展了武侠电影的艺术表现空间。《镖人:风起大漠》承接了武侠电影的类型传统,将豪迈的江湖气象融入行进的镖途,使人物关系随着旅程不断展开。袁和平多年的动作创作经验,在影片中得到了新的运用,李连杰、吴京、张晋等演员也带来不同年代的武侠气韵。这些经验融入人物塑造、动作设计与影像表现,使经典传统成为当代创作的重要艺术基础。

武侠电影的魅力,深植于中国武术与电影语言的结合。拳脚开合、兵刃交接、纵马疾行,借助影像语言与场面调度,化作富有节奏与力量的视听表达。影片以凌厉刚劲的动作风格塑造人物,注重身体运动的连贯性及攻守之间的力量变化。刀马的灵活应变、谛听的沉重凌厉,通过不同的招式与姿态呈现出鲜明的性格特征。镜头对人物运动方向与空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增强了打斗场面的视觉张力。动作节奏的张弛传递人物情绪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物与戏剧冲突的不断发展。动作设计与人物塑造、情节叙事相互融合,延续了中国武侠电影以动作刻画性格、以行为传递情感的艺术传统。

武侠电影深厚的人文内涵,始终与侠义精神相连。影片通过人物之间的承诺、扶助与抗争,使传统价值融入具体的生命处境。刀马游走江湖、谋求生计,依然保有对弱者的怜悯,老莫将族人的安危系于心间,阿育娅以坚韧回应命运的磨难。不同人物的选择交织出重诺守信、扶危济困、崇尚公义的精神底色,让苍凉的江湖多了一份人情温度。武术动作因人物的道义抉择而具有精神内涵,侠义理想也通过人物塑造转化为生动的银幕呈现。动作传统、江湖叙事与人文情怀在影片中交融,彰显出中国武侠电影独有的艺术风骨。

► 当代重塑:武侠电影的影像创造与类型更新

传统武侠能否在当代银幕上焕发新意,关键要看它在新的作品里如何被重新表现。《镖人:风起大漠》将这种探索融入自然景观与人物动作的结合当中,形成富有辨识度的影像风格。影片以西域大漠为主要影像空间,将荒原的辽阔、戈壁的险峻与人物的奔袭交锋融为一体。远景中,马队穿行于苍茫天地,开阔的景别呈现出雄浑气势;近景中,风沙侵袭、脚步受阻与兵刃碰撞,则带来更为直接的力量感。影片依据大漠地形设计镜头运动和演员调度,在壮阔的空间景观中强化动作场面的视觉张力,形成粗粝、紧张而富有层次的影像风格。

这样的视觉效果,来自镜头运动、动作设计、剪辑节奏与声音表现的共同作用。风沙遮蔽视线,狭窄地形限制人物的移动与闪避,骑乘状态改变攻守的距离与速度,环境条件不断影响动作场面的表现。影片根据不同地形调整动作设计,让人物的应变、速度的变化与空间的险峻相互呼应。镜头运动将辽阔景观与紧张的局部运动联系起来,剪辑强化交锋中的节奏起伏,兵器交击、马蹄奔踏与风声呼啸则充实了场面的听觉层次。画面与声音的紧密配合,强化了大漠环境的粗粝质感,进一步增强了动作场面的现场感与视听表现力。

在叙事形式上,影片以护镖任务确立贯穿全片的故事主线,将漫画中丰富的人物线索集中于一段西域旅程。随着刀马一行穿行大漠,不同势力相继介入,人物的相遇、追逐与对抗推动情节逐步展开。影片借鉴公路电影的行进式结构,通过连续的空间转换串联不同的戏剧事件,使传统武侠的江湖冒险具有明确的叙事方向。护镖任务为不同人物的登场及其关系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叙事情境,沿途不断升级的矛盾强化了故事的戏剧张力。动作场面紧扣局势变化,与情节推进形成紧密联系。武侠叙事与公路电影结构的结合,使影片在相对集中的故事主线中呈现丰富的江湖纷争,形成连贯而富有变化的叙事节奏。

人物群像进一步丰富了影片的情感层次。护镖旅程汇聚了身份、处境与追求各异的江湖人物,生计的压力、亲情的牵挂、家园的责任与个人的执念,在沿途的相遇和冲突中逐渐显现。影片通过人物之间的信任、分歧与相互扶助,展现不同人物面对利益与道义时的选择,使江湖群像呈现出丰富的性格特征与情感面貌。不同人物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追求,也为传统武侠的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加贴近现实的人文内涵。

丰富的群像塑造,为观众理解人物命运提供了多样的情感入口。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情感牵系与价值抉择在刀光剑影之外构成富有生活温度的情感线索,与当代观众熟悉的现实生活形成呼应,使观众能够在理解人物境遇的过程中产生共情。影片以独特的影像风格增强视听感染力,以旅程式的结构推进叙事发展,以群像关系承载情感共鸣,使不同创作要素相互支撑,形成具有当代气息的整体艺术表达,也为武侠类型持续创新拓展了空间。

► 复兴之思:武侠电影的艺术活力与发展可能

该片重新唤起的,是观众对武侠电影的期待与信心。面对观影渠道日益多元、观众审美需求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经典类型需要通过持续的艺术创造展现新的吸引力。影片以鲜明的动作风格、富有质感的银幕空间和具有温度的人物关系,使武侠电影独特的观看乐趣得到充分展现。熟悉的刀剑与江湖经过电影语言的当代性转化,形成紧张的戏剧冲突、富有冲击力的视听场面和动人的情感体验,使观众在重温武侠记忆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审美感受。武侠电影所形成的动作美学与叙事传统在影片中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也为这一类型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在影院大银幕环境下,壮阔的自然景观、快速变化的动作细节与富有层次的声音表现,同时也强化了动作场面的沉浸感与情绪张力,彰显出武侠电影在影院观赏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更值得思考的是,影片的创作展现了传统资源的开放性。武侠电影拥有丰富的叙事母题和审美形式,但这些积累绝不是一套必须原样照搬的规则。大漠环境可以改变动作设计的表现形式,漫画可以为武侠注入不同的故事想象,人物群像也能让江湖承载更加丰富的现实情感。只有让武侠电影的美学传统在创作中不断创新发展,才能形成契合观众审美需求的艺术表达,使这一类型焕发新的生命力。武侠电影不必在坚守传统与追求创新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有创造力的作品,总能让观众在熟悉的类型气质中感受到新的艺术发现。

由此再看这部武侠新作的意义,便不能仅以票房成绩来衡量。单部作品的成功,能够让一种类型重新被看见,却不能自动带来接连不断的佳作。类型真正的复兴,既需要鲜明的艺术个性,也需要不断容纳新故事、新人物和新表达的创造能力。影片通过影像风格、叙事形式与人物塑造的创新,重新唤起观众对武侠电影的审美热情,也为这一类型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我们所期待的,并非每隔若干年才有一次令人激动的武侠重聚,而是更多武侠电影创作者能够沿着不同方向,写出属于各自时代的江湖。

《镖人:风起大漠》使中国武侠电影的艺术气韵在当代银幕上得到生动呈现。苍茫天地间有人的力量,险途风尘中有信义的分量,经典传统也在新的影像创造中焕发光彩。武侠的当代性植根于艺术表达的创新,让鲜活的人物、可信的行动和富有个性的电影语言,继续承载人们对勇气、公义与自由的想象。影片引发的热烈回响,再次彰显了武侠电影持续创新的艺术潜能。回归经典,是为继续前行积蓄力量。期待复兴,则是期待更多作品在传统的土壤上开出新花,以属于今天的电影语言讲述新的江湖故事,不断创造能够留存在观众心中的武侠经典。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茹纪晓,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